

# 内蒙古翁牛特旗新发现古代 基督徒墓顶石初探

唐晓峰

中国古代基督教研究是国际汉学界以及东西交通史研究领域的热门话题，蒙元基督教研究是其中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国内发现的蒙元时期基督教遗迹主要集中在福建泉州、新疆阿力麻里、内蒙古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和四子王旗。本文作者在内蒙古翁牛特旗新近发现的古代基督徒墓顶石是迄今为止我国最靠东部的古代基督徒遗迹。从发现地历史、墓顶石形制以及附近松州故址发现的另一方古代基督徒墓碑所载碑铭推断，作者认为墓主人应为元代全宁路弘吉剌部陪臣或下嫁弘吉剌部各位公主的媵臣。

关键词：中国 古代基督教 基督徒墓顶石 聂斯托利派 全宁路

作者 唐晓峰，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

我国境内的古代基督教遗迹遗物虽不多，但也绝不罕见。19世纪以来，各地陆续有唐至蒙元时期基督教遗迹、经卷、墓地、碑刻等被发现。对于这些遗迹遗物的研究曾一度构成中西交通史乃至国际汉学界研究的热门学问。国际著名汉学家如古伯察（Evariste Régis Huc，1813 - 1860）、巴拉第（Пётр Иванович Кафаров，1817 - 1878）、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 - 1945）、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1862 - 1943）、明甘那（Alphonse Mingana，1878 - 1937）、佐伯好郎（Peter Yoshiro Saeki，1871 - 1965）等均曾关注中国古代基督教及遗迹问题，国内著名史家张星娘、陈垣、方豪、朱谦之等亦对此专题进行过深入探讨。

从发现数量上看，境内较具规模的古代基督教遗迹遗物，主要集中在福建泉州、内蒙古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和四子王旗、甘肃敦煌、新疆吐鲁番及阿力麻里等地，上述这些地区的相关遗迹遗物除敦煌和吐鲁番地区的经卷、壁画、绢画外，其他多以基督徒墓葬形式为主。从这些墓葬的年代上看，它们多集中于蒙元时期。对于这些墓葬的形制及碑铭的研究与诠释，中外学者做出过大量努力，吴文良的《泉州宗教石刻》<sup>①</sup>、盖山林的《阴山汪古》<sup>②</sup>、牛汝极的《十字莲花——中国元代叙利亚文景教碑铭文献研究》<sup>③</sup>等著作均为该领域的扛鼎之作。这些古代基督徒墓葬构件、碑铭多收藏于当地博物馆中，在上述几个地区每年还陆续发现新的墓葬碑刻。除此之外，北京、江苏扬州、内蒙赤峰等地也曾零星发现蒙元时期基督徒的墓碑或墓葬，虽不构成规模，但这些零星分布的基督徒遗迹所凸显的学术意义毫不逊色，它们的出现直接证明了一种异质信仰乃至群体在该地历史上的存在，这比任何想象及理论上的论证要确实得多。本文将关注

① 吴文良 《泉州宗教石刻》（增订本），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② 盖山林 《阴山汪古》，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③ 牛汝极 《十字莲花——中国元代叙利亚文景教碑铭文献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蒙东地区新发现的一方古代基督徒墓顶石。

### 一、墓顶石形制描述

2018年7月初，笔者与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杨熙楠总监、清华大学博士候选人谭大卫先生赴内蒙古自治区敖伦苏木古城、河北沽源县“梳妆楼”、内蒙古赤峰市等地调研元代基督教遗址，回程途中听闻赤峰市翁牛特旗古代艺术博物馆院内存放一方带有十字图案石刻，遂返回查看。以下为该石刻基本情况：该石刻经初步判定为砂岩材质古代基督徒墓顶石，长约1.34m，端面宽0.5m，底端宽0.44m，高0.37m，整体形制如图所示似棺形（图一），从端面到尾部逐渐收窄，顶部呈梯形。除端面镌有图案外，整个墓顶石顶面、侧面及底面暂未发现任何文字和图案（图二）。所镌图案位于端面左半部分，以一个明显的叙利亚东部教会十字架作为标志，与国内其他地点发现的聂斯脱里派十字架形态类似——四臂等长渐宽似箭头，十字架下有一底座缺损无法辨识，通过残存部分观察，并不像莲花，端面上下分隔，十字架在下半部分，约0.11m见方。令人惋惜的是整个端面右半部分遭人为损坏，无法判断端面上半部分及右半部分内容（图三）。墓顶石底部平坦，但已被当地村民凿为马槽（图四）。据翁牛特旗古代艺术博物馆馆长张军先生回忆，该石刻是他多年前从翁牛特旗乌丹镇北大庙村征集所得，最初发现地点在该村后山坡上。



## 二、墓顶石来历分析

翁牛特旗乌丹镇地处内蒙古东部，西南距内蒙古赤峰市古松州遗址100公里，北距辽代上京巴林左旗150公里，西距克什克腾旗元代应昌路250公里。在此之前翁牛特旗境内未发现任何古代基督教遗迹，该墓顶石的发现将成为此地基督徒活动的最早证明。从整个赤峰市来说，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第二方古代基督徒墓葬构件。20世纪80年代，赤峰市松山区城子乡城子村曾经发现一方窝阔台汗时期瓷质基督徒墓碑。<sup>①</sup>那么，此次发现的古代基督徒墓顶石是否与之前赤峰发现的墓碑有所关联？墓主究竟为何人？为了弄清这些问题，我们先从乌丹镇的历史说起。

### （一）从乌丹城历史推断墓顶石年代

乌丹镇是红山文化的发源地，“中华第一龙”便出土于其辖区的三星他拉村。在历史上，乌桓、鲜卑、库莫奚、契丹等少数民族均曾生活于此。乌丹辽属上京道，统和十三年（995年）设立丰州，后改名澄州。金改澄州为全州，金章宗承安元年（1196年）六月“甲寅，置全州盘安军节度使，治安丰县。”<sup>②</sup>在大蒙古国时期，作为五投下的弘吉剌部南下征战有功，成吉思汗对其家族成员进行封赏，其封地由漠北移到地理条件较好的漠南地区，乌丹便属弘吉剌部首领按陈的受封之地，《元史》对此有如下记载“岁甲戌，太祖在迭蔑可儿时，有旨分赐按陈及其弟火忽、册等农土，若曰‘是苦烈儿、温都儿斤，以与按陈及哈撒儿为农土’。申谕按陈曰‘可木儿温都儿、答儿脑儿、迭蔑可儿等地，汝则居之。’……至至元七年，斡罗陈万户及其妃囊加真公主请于朝曰‘本藩所受农土，在上都东北三百里答儿海子，实本藩驻夏之地，可建城邑以居。’帝从之。遂名其城为应昌府。二十二年，改为应昌路。元贞元年，济宁王蛮子台亦尚囊加真公主，复与公主请于帝，以应昌路东七百里驻冬之地创建城邑，复从之。大德元年，名其城为全宁路。”<sup>③</sup>元成宗追封弘吉剌部首领按陈为济宁王，其后人蛮子台承袭了济宁王封号，之后更被进封鲁王。根据上述文献，按陈得到克什克腾旗和翁牛特旗一带封地后，其后裔蛮子台和囊加真公主在元贞元年（1295年），请求建全宁城（乌丹元代旧称）。同样根据《元史》记载，大德二年（1298年）二月，“戊戌，升全州为全宁府。”<sup>④</sup>大德七年（1304年）七月十一月“辛未，升全宁府为路。”<sup>⑤</sup>乌丹城之后的扩建主要归功于忽必烈太子真金孙女祥哥剌吉大长公主，她于仁宗延祐四年（1317年），在全宁府东建三皇庙，次年又在全宁城的西南建护国寺，1325年，在全宁路修建儒学。天历二年（1329年）开始，祥哥剌吉在其侄文宗的鼎力支持下，重新扩建全宁路。<sup>⑥</sup>

① 1985年，内蒙古赤峰市松山区文物管理所在位于该市松山区城子乡城子村的元代松州故址发现一通立于窝阔台汗时期的古回鹘文也里可温瓷质墓碑。墓碑发现后，受到学界广泛关注，碑铭得以翻译、研究，详见本文之后讨论。另请参阅张松柏《内蒙古赤峰市松山区出土的也里可温教瓷质墓碑》，载《海交史研究》，1994年第1期；James Hamilton、牛汝极《赤峰出土景教墓碑铭文及族属研究》，载《民族研究》，1996年第3期；王大方《内蒙古赤峰市松山区出土窝阔台汗时期的古回鹘文景教瓷碑考》，载《内蒙古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9期。

② 《金史》卷十“本纪第十·章宗二”。

③ 《元史》卷一百一十八“列传第五·特薛禅”。

④ 《元史》卷十九“本纪第十九·成宗二”。

⑤ 《元史》卷二十一“本纪第二十一·成宗四”。

⑥ 《元史》卷三十三“本纪第三十三·文宗二”：天历二年春正月，“赐鲁国大长公主钞二万锭营第宅。”五月丁巳朔，复赐鲁国大长公主钞二万锭，以构居第。”十二月“戊戌，以淮、浙、山东、河间四转运司盐引六万，为鲁国大长公主汤沐之资。”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元文宗曾诏谕廷臣曰“皇姑鲁国大长公主，蚤寡守节，不从诸叔继尚，鞠育遗孤，其子袭王爵，女配予一人。朕思庶民若是者犹当旌表，况在懿亲乎？赵世延、虞集等可议封号以闻。”这里的廷臣赵世延便来自于汪古部基督徒世家。

在其统治时期，乌丹城的建设规模达到顶峰，直到 1360 年被红巾军所毁。经考古勘察，全宁古城呈正方形，边长 1 公里，周长 4 公里，北至乌丹一中北墙，南抵今向阳街南侧，东到原旗粮油加工厂胡同，西达今全宁路东侧。<sup>①</sup>

通过追溯辽金元三个朝代乌丹建城的历史，我们虽无法得知墓主人的身份，但却可以根据当时城市创建者的信仰背景、城市规模、城市功能来对此加以推断。辽金之际包括蒙元初期，乌丹城规模不大。翰林侍读学士沈括曾于宋熙宁八年（1075）出使契丹上京，途经澄州城西门之外时看到“州有土垣，崇六七尺、广度一里，其中半空，有民家一二百，屋有泥墁，间有瓦覆者，旧日丰州州将率其部落和扣河西内附，诏置丰州以处之，自尔改今名。”<sup>②</sup>照此描述，此时澄州与一村无异，契丹人崇信佛教，丰州存在基督徒且按照基督教样式埋葬于此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全州城在金代史料中虽有提及，但政治重心的转变让全州城甚至失去了辽时的地位，从元代建城对此地仅提及“应昌路东七百里驻冬之地创建城邑”来看，当时全州规模不会大于辽代。



如上所述，全宁城元贞元年 1295 年开始建城，尤其是 1303 年开始升格为路后，作为弘吉剌部的驻冬藩府，开始逐渐兴盛，经过元成宗、武宗、仁宗、文宗四位皇帝的大力资助，在推崇文化多元、宗教宽容的祥哥剌吉统治时期全宁路成为塞外名城。弘吉剌部统治者除实行宗教宽容政策外，还广纳贤才，这个阶段有基督徒长居于此的可能性增大。比如河北清河县人张应瑞便臣属于弘吉剌部，因其才干出众，赤胆忠心，初赠中虞大夫，后又加赠荣禄大夫，死后追封为蓟国公，中统三年（1335）皇帝下诏为其立碑，丹书者是西域著名书法家康里巎巎。如今“大元敕赐荣禄大夫辽阳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柱国追封蓟国公张氏先茔碑”便矗立于翁牛特旗梧桐花镇国公府村。住童为张应瑞之子，立于同处的《住童先德碑》亦由康里巎巎书丹，碑文撰写者为西

① 关于全宁路的建设及规模，详见吴甲才《元·全宁路鲁王城的兴毁及其相关问题的考证与研究》，载中国古都学会、赤峰古都学会编《中国古都研究》（第十八辑下册），国际华文出版社，2001年，第181-199页。

② 沈括《熙宁使虏图抄》，转载于王民信《沈括熙宁使虏图抄笺证》，台北：学海出版社，1976年12月版，第131页。据《辽史》圣宗记，统和十三年六月甲申“以宣徽使阿没里私城为丰州”，阿没里在《辽史》卷七九有传“耶律阿没里，字蒲邻，遥辇嘲古可汗之四世孙……性好聚敛，每从征，所掠人口聚而建城，请为丰州，就以家奴阎贵为刺史。”王民信认为，《熙宁使虏图抄》中的丰州州将或系指耶律阿没里，在本书中作者对于丰州有诸多考证，但很难将其居民与信奉聂斯脱里派的基督徒相联系。

域著名文学家、基督教聂斯脱里派后人马祖常。<sup>①</sup>至顺二年出任济宁路达鲁花赤的唐兀人秃满台同样来自应昌路弘吉剌部封地。其祖父赫思原居河西，后迁居应昌。值得一提的是，唐兀在蒙元时期亦是基督教聂斯脱里派传播的重镇，这里曾经是聂斯脱里教会在中国的四个主教驻节地之一。<sup>②</sup>此外，鲁国大长公主的媵臣竹温台，因鲁王认为“其才可大用”，后擢升为全宁路达鲁花赤。<sup>③</sup>弘吉剌部的封邑不止于应昌、全宁两路，还包括济宁路、汀州路<sup>④</sup>、永平路<sup>⑤</sup>，这些分邑的达鲁花赤及以下官员多由弘吉剌部陪臣担任，上述各地间的往来频繁，在全宁路北大庙北马场还曾出土一块石碑，长105厘米，宽65厘米，碑文汉字阴刻“大元敕授近义副尉永平路乐亭县达鲁花赤兼管诸军奥鲁劝农事和扎孙[思]<sup>⑥</sup>之莹”。在这些陪臣中不乏基督徒，后文我们将论及。翁牛特旗乌丹镇发现同材质伊斯兰教墓顶石有两方。一方存于翁牛特旗博物馆，另一方置于本文所述墓顶石旁，该墓顶石镌有阿拉伯文铭文（见图五、图六）。据伊斯兰教研究专家解读为“逝者名艾哈迈德·本·\*\*\*·拉马丹·格兹维尼”，还有一句《古兰经》语“凡有血气者，都要尝死的滋味。”<sup>⑦</sup>

由此可见，乌丹城西北北大庙附近后山应有元人王族墓地存在，这其中葬有伊斯兰教徒，也有基督徒。墓主身份可能为随弘吉剌部南下漠南并征战各地的陪臣，也可能是历代下嫁到弘吉剌部各公主的媵臣。<sup>⑧</sup>

- ① 参阅王大方《内蒙古赤峰市翁牛特旗元代“张氏先莹碑”与“住童先德碑”》，载《文物》，1997年第7期。
- ② 胡祖广：《武略将军济宁路总管府达鲁花赤先莹神道碑》，道光《巨野县志》卷20，第46b-47b页。另请参阅张佳佳《元济宁路景教世家考论——以按檀不花家族碑刻材料为中心》，载《历史研究》2010年第5期。
- ③ 竹温台死后葬于翁牛特旗乌丹镇乌兰板，其生平见《大元敕赐诸色匠人府达鲁花赤竹温台之碑》，参阅李俊义、李彦朴编著《草原金枝：元朝鲁国大长公主祥哥剌吉研究》（上册），赤峰：内蒙古科学技术出版社，2018年4月版，第466页。
- ④ 《元史》卷二十六“本纪第二十六·仁宗三”记载夏四月，庚戌，敕“安远王丑汉分地隶建宁者七县、汀州者三县，达鲁花赤听其自辟。”丑汉便为弘吉剌部按陈裔孙。
- ⑤ 《元史》卷二十二“本纪第二十二·武宗一”：“乙亥，以永平路为皇妹鲁国长公主分地，租赋及土产悉赐之。”另见《元史》卷二十四“本纪第二十四·仁宗一”：“丁巳，奉太后旨，以永平路岁入，除经费外，悉赐鲁国大长公主。”《永平府志》卷之一“世纪”对此亦有相关记载，“十一年，武宗即位，秋七月乙亥，以永平路为皇妹鲁国长公主分地，租赋及土产悉赐之”、“武宗至大元年夏四月，诏以永平路盐课赐祥哥剌吉公主，中书省臣执不可，乃止”、“仁宗至大四年秋九月丁巳，以永平路岁入，除经费外，悉赐鲁国大长公主。”参阅宋琬编纂《永平府志》，清康熙50年（1711）刻本。
- ⑥ 据了解，当地百姓修梯田时，将此碑埋入地下，但碑座砾质还在。此字为“思”亦或“恩”，史料对此记载不一。
- ⑦ 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伊斯兰教研究室李林、王希、马景诸位老师的协助。
- ⑧ 按照《元史》卷一百一十八“列传第五·特薛禅”的记载“凡其女之为后者，自光献翼圣皇后以降，宪宗贞节皇后讳忽都台，及后妹也速儿，皆按陈从孙忙哥陈之女。世祖昭睿顺圣皇后讳察必，济宁忠武王按陈之女；其讳帖古伦者，按陈孙脱怜之女；讳喃必册继守正宫者，纳陈孙仙童之女。成宗贞慈静懿皇后讳实怜答里，斡罗陈之女也。顺宗昭献元圣皇后讳答吉，大德十一年十一月，武宗册上皇太后，至大三年十月，加上尊号曰仪天兴圣慈仁昭懿寿元皇太后，仁宗延祐二年，加上尊号曰仪天兴圣慈仁昭懿寿元全德泰宁福庆皇太后，延祐七年，又加徽文崇祐四字，尊号太皇太后，则按陈孙浑都帖木儿之女。武宗宣慈惠圣皇后讳真哥，脱怜子进不刺之女；其讳速哥失里者，按陈从孙哈儿只之女。泰定皇后讳八不罕，按陈孙斡留察儿之女；其讳必罕、讳速哥答里者，皆脱怜孙买住罕之女。文宗皇后讳不答失里，雕阿不刺鲁王之女。此则弘吉剌氏之为后者也。”另据《元史》表第四·诸公主表记载“鲁国大长公主也速不花，睿宗女也，适皇国舅鲁忠武王按慎那颜子斡陈附马。鲁国公主薛只干，太祖孙女，适斡陈弟纳陈附马。鲁国长公主完泽，适斡陈男斡罗真附马。鲁国大长公主囊加真，世祖女，适纳陈子帖木儿，再适帖木儿弟蛮子台。鲁国大长公主南阿不刺，裕宗女，适蛮子台。鲁国徽文懿福（贞）寿大长公主祥哥剌吉，顺宗女，适帖木儿子瑯阿不刺。鲁国大长公主普纳，适帖木儿子鲁王桑哥不刺。肃雍贤宁公主朵儿只班，适瑯阿不刺子阿里嘉实利。大长公主拜塔沙，适按陈裔孙买住罕。台忽普都公主，适按陈裔孙安远王丑汉。唆儿哈罕公主，太宗女，适按陈孙纳合。斡可真公主，适火忽孙不只儿。不鲁罕公主，适特薛禅孙脱罗禾，继室以仁宗女阔阔伦公主。”

## (二) 从墓顶石形制推断墓顶石族属

蒙元时期基督教群体构成的主体是蒙古化的突厥部落，他们信奉基督教聂斯脱里派，这其中以汪古部、克烈部及部分乃蛮部为代表，蒙哥、忽必烈的母亲唆鲁禾帖尼便为克烈部虔诚的基督徒，汪古部信仰基督教这点在《马可波罗游记》《多桑蒙古史》等诸多史料中有明确记载，汪古部高唐王阔里吉思甚至还在来中国传教的首位天主教主教孟高维诺手下由聂斯脱里派改宗天主教；除此之外，还有很多聂斯脱里派基督徒来自中亚或西亚。随着蒙元帝国版图的扩大，他们有的被整编到蒙古军队四处征战，随后驻军或留居蒙元疆域；有的在蒙元境内为官或经商——他们属于色目人群体，元代史料对此多有提及。来自西域的马祖常、来自弗林的崇福史爱薛、来自撒马尔干的镇江路副达鲁花赤马薛里吉斯及其家族均属此类。聂斯脱里派基督教以外，蒙元时期的基督教尚有来自罗马的天主教徒、来自罗斯的东正教、来自亚美尼亚的基督徒、来自北高加索的阿兰人以及叙利亚正教会，即雅各派。<sup>①</sup>从全宁路地域发展史、各教派在蒙元时期的传布以及墓顶石的形制看，墓顶石主人来自后面这些教派的可能性不大，尤其是从四臂等长的十字架形制判断，几乎可以肯定其来自于叙利亚东部教会，即基督教聂斯脱里派。其他无论正教，还是天主教、亚美尼亚教会或雅各派的十字架形制均与此明显不同，这点也为国内各地发现的其他聂斯脱里派十字架所证实，墓顶石的主人应来自于蒙古化的突厥部落或寓居中国为官的聂斯脱里派信徒，对于这种猜测，我们可对比于国内各处发现的蒙元基督教墓顶石或墓碑。



蒙元基督徒墓顶石发现最多的区域当在内蒙古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以及邻近的四子王旗，还有福建泉州。前者属于汪古部领地，汪古部多信仰基督教聂斯脱里派这点已为中外史家所公认为。汪古部的墓顶石较为独特，对此在盖山林的《阴山汪古》中有较为详尽的介绍，笔者也曾于2018年7月初赴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文管所交流，所拍摄的墓顶石如图七、八、九所示。这些墓顶石均一头呈方形，方形部分顶面、两侧面及端面装饰有十字架、或花卉图案，方头以外碑身部分尺寸收小，顶面用叙利亚语镌刻墓主名字，这些墓顶石最长约1.3m，宽0.30-0.45m，高0.3m到0.48m，整体来说较翁牛特旗发现墓顶石形制为小但雕刻更为精细。唯一相似点在两端大小不一，逐渐收窄，但细节处差异明显。

笔者也曾于2008年6月和2016年12月两次赴泉州海交史博物馆调研，所拍摄墓顶石如图十、十一、十二所示，从中可看出这些墓顶石端面分两种：一种为尖顶房屋形制，一种为须弥座形制，其整体形制与本文所研究墓顶石接近，但泉州的墓顶石两端等宽。值得注意的是，在泉州，伊斯兰教墓顶石与基督教墓顶石形状大体一致，两者间不同的是上面的花纹及文字。与敖伦苏木古城发现的墓顶石一样，这些出土于泉州的墓顶石工艺娴熟，明显有专门的从业人员按照标准规范镌刻石材。与上述两者对比起来，翁牛特旗发现墓顶石更接近于泉州海交史博物馆墓顶石样式，除端面镌刻图案、侧面与顶面刻有线条外，几乎无任何标记。那么泉州和达尔汗茂名安联合旗的信徒身份有何不同呢？

<sup>①</sup> 参阅拙著《元代基督教研究》“第三章元代基督教的族群及构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



泉州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蒙元时期的刺桐港被誉为“东方第一大港”，泉州古城东门外大量的蕃人墓地说明当时众多外国人旅居于此，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展品充分揭示了当时“刺桐港”国际贸易的繁忙与辉煌。这里出土古代基督徒墓葬众多，从泉州在当时的城市功能来说，这些人多为商旅，也有少数蒙元派驻过来的各级官宦，其碑铭文字记载这些基督徒多是突厥种族，最远的甚至来自东南欧。根据吴文良先生《泉州宗教石刻》一书及牛汝极《十字莲花——中国元代叙利亚文景教碑铭文献研究》一书的转译内容，我们可知这些碑文除天主教徒外，多使用叙利亚文拼回鹘语、突厥语，也有个别八思巴文和汉语碑刻。有学者据此推断很多泉州的基督徒来自于汪古部。事实上，我们不能根据汪古部族源有回鹘人而将使用回鹘语且信仰基督教的突厥人都认为是汪古部，泉州出土乌斯提克·塔斯汗的碑铭使用叙利亚语拼写回鹘语，他却是高昌回鹘的基督徒。<sup>①</sup>此外，在七河流域<sup>②</sup>、江苏扬州、赤峰松州古址发现的墓志铭、甘肃敦煌发现的聂斯脱里派写经残片也多用回鹘语书写。蒙元时期回鹘语的使用范围较广，远不止汪古部这样简单。当然不排除这其中有个别任职于此的汪古部基督徒，但作为蒙古化的突厥部落或

① 参阅牛汝极《十字莲花——中国元代叙利亚文景教碑铭文献研究》，第124-126页。

② 参阅牛汝极《中亚七河地区突厥语部族的景教信仰》，载《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7期。该文指出，“根据墓碑上叙利亚文本的一些突厥语题字推断，回鹘语在宗教场合也有一定使用，在吐鲁番发现的基督教写本证实了这一点。阿力麻里发掘的墓碑题字也有一些是突厥语，因此可以推断，该地民众的母语应该是回鹘语或其他突厥语。”

属民的一部分，他们大规模远赴东南沿海经商或生活的可能性很小。从泉州地区这些古基督徒墓葬与来自中亚和西亚的穆斯林使用共同墓葬形式这点看<sup>①</sup>，他们来自中亚和西亚的可能性很大，至今新疆喀什一带的墓顶石形制仍与泉州伊斯兰教徒和基督徒的墓顶石接近。

从敖伦苏木古城及邻近地区出土的墓顶石来看，虽然其十字架样式，以及墓顶石装饰的莲座、云纹、火灯窗等图案与泉州出土墓顶石一致，但整体形制区别较大。达茂旗与四子王旗的墓顶石在形制上除精美与简陋、大小尺寸上的区分外，几乎完全雷同，这符合一个稳定的族群长期生活于此的特征。<sup>②</sup> 翁牛特旗乌丹镇古时非贸易集散地，更非基督徒集聚区，该墓顶石只能属于长期在此定居的外来人士，非官宦几无其他可能，从其墓顶石形制来看，其家族来自中、西亚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 （三）从松州故址出土“药难”墓碑推断墓顶石主人

距离翁牛特旗西南约 100 公里的赤峰松山区城子乡城子村是元代松州故址<sup>③</sup>，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曾在这里的北山坡上发现一块窝阔台汗时期基督徒瓷质墓碑。学者一度认为那是“在蒙古草原上所见也里可温教活动的最东轨迹”<sup>④</sup>，从地理位置上看，无疑这次翁牛特旗发现的墓顶石要比这块墓碑更靠近东北方。关于这块墓碑，James Hamilton 和牛汝极对其叙利亚及回鹘语碑铭进行过解读，内容如下：“亚历山大帝王纪年一千五百六十四年（公元 1253 年），桃花石纪年是牛年正月二十日，这位京帐首领药难（Yawnan）——部队的将军，在他 71 岁时，完成了上帝的使命。愿这位大人的灵魂永久地在天堂安息吧！”<sup>⑤</sup> 牛汝极先生曾根据松山区城子乡出土墓碑的地域及汪古马氏家族曾迁往辽东的事实说明“药难”将军很有可能是来自汪古部的基督徒。但汪古部驻地以及辽东距赤峰松山区均十分遥远且属于不同部落封地的事实会引发人更多疑问。张佳佳发现的新文献倒是给人以更多想象空间，在其《元济宁路景教世家考论——以按檀不花家族碑刻材料为中心》一文中，作者提到“按檀不花的祖父岳雄，后来追随弘吉刺部首领按陈移家松州；今天赤峰市松山区也有景教遗物出土，其中一方墓砖颇能让人产生一些与岳雄有关的联想。”<sup>⑥</sup> 之所以得出如此猜想，与他新发现《巨野县志》中的几方碑文相关，根据济宁路达鲁花赤按檀不花（1243—1322）《少中大夫按檀不花碑暨夫人辛陈氏合葬神道碑》及其二子骚马（1261—1335）《乐善公墓碑》的记载与整理，按檀不花“世为阿里马里<sup>⑦</sup>人氏”，其祖父“岳雄”获成吉思汗“授玺书虎符，岁时持圣训谕宏吉烈部”，后来成为弘吉刺氏首领按陈的下属。“岳雄”在弘吉刺部地位颇高，“班济宁忠武王下，诸驸马皆列坐其次，事无大小，一听裁决”，后随弘吉刺部在松州安家，按檀不花的夫人亦葬于松州。据此张佳佳认为“岳雄”的“雄”字可能是“难”的讹写，赤峰市松山区墓碑的主人“药难”可能便是“岳雄”，按檀不花很可能

① 参阅福建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编《泉州伊斯兰教石刻》，宁夏人民出版社、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图 117—122。

② 对于汪古部的族源有多种说法，主流观点认为它是南迁回鹘、唐末沙陀人、阴山本地突厥人、流亡契丹人及少量汉人的混合。但无论何种观点，到蒙元时期，其在阴山一带已经定居至少两百余年是不争的事实。

③ 该地曾经为弘吉刺部按陈子唆鲁火都的封地，《元史》卷一百一十八记载“又谕按陈之子唆鲁火都曰：‘以汝父子能输忠于国，可木儿温都儿迤东，络马河至于赤山，涂河迤南，与国民为邻，汝则居之。’”络马河即今阴河，赤山即赤峰市红山、涂河即今老哈河。

④ 也里可温为元代对于基督教聂斯脱里派的称呼。关于该墓碑详情，请参阅张松柏《内蒙古赤峰市松山区出土的也里可温教瓷质墓碑》，载《海交史研究》1994 年第 1 期。

⑤ James Hamilton、牛汝极《赤峰出土景教墓砖铭文及族属研究》，载《民族研究》1996 年第 3 期。

⑥ 张佳佳《元济宁路景教世家考论——以按檀不花家族碑刻材料为中心》，载《历史研究》2010 年第 5 期。另外可参阅马晓林《元代景教人名学初探——以迁居济宁的阿力麻里景教家族为中心》，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 年第 1 期。

⑦ 即阿力麻里。



小时候在松州出生。张佳佳的联想确有一定说服力，前面我们已经提过，元代济宁路恰为蒙古弘吉剌部的封地，弘吉剌部“得任其陪臣为达鲁花赤”，“药难”的后人赴封地任职也在情理之中。

“岳雄”的故里阿力麻里曾经是察合台汗国的都城，那里及附近七河流域曾经出土过大量聂斯脱里派基督徒墓碑。附近的撒马尔罕也曾是聂斯脱里派在中亚的主教驻节地之一。来自阿力麻里的按檀不花家族属基督徒世家不足为奇。而其祖父“岳雄”曾随成吉思汗征战，因功勋卓著，被派往“后族”弘吉剌部作为陪臣，并终老于松州故址的经历恰与翁牛特旗北大庙北山发现的墓顶石主人有几分相似。<sup>①</sup>更为巧合的是“岳雄”曾孙变德古思按《乐善公墓碑》的记载恰为全宁路达鲁花赤。

行文至此，我们不妨做出如下大胆假设：来自阿力麻里的基督徒“岳雄”因功勋卓著，被成吉思汗任命为弘吉剌部受封漠南之地初期的权臣，其子别古思继承了父亲的职位<sup>②</sup>，别古思之子按檀不花出生在松州，受到鲁王的器重，被派往其封地济宁路任职，最终担任达鲁花赤，按檀不花的妻子辛氏死后葬于松州。其子孙中才华出众者也有回到弘吉剌部担任官职者，长子变德古思便担任全宁路达鲁花赤。“岳雄”后人虽移居中原，但仍保持着虔诚的基督教信仰，按檀不花二子骚马甚至直接担任也里可温掌教司官一职。如此来看，同样作为弘吉剌部在漠南封地的全宁路和松州一样，居住着“岳雄”的后人或像“岳雄”一样祖籍中亚的聂斯脱里派信徒完全可能，担任全宁路达鲁花赤的变德古思或许就葬在全宁城外的北大庙后山，这一切也未可知。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虽然仍无法确切得出翁牛特旗出土的这块墓顶石的主人，但通过梳理，我们基本可确认该墓建造的年代应在元全宁路建城之后，尤其是其作为弘吉剌部的“冬都”在历任皇帝的支持之下逐渐兴盛之后。墓主人应为弘吉剌部的陪臣或历任下嫁弘吉剌部各公主的媵臣，像按檀不花之子变德古思一样，他们祖籍中亚，有着虔诚的聂斯脱里派信仰，死后葬于此处。同时通过对这一墓顶石的分析，笔者认为元代基督教的研究尚有诸多可深入探讨之处，这里试举几例：（1）蒙元时期的基督教信仰族裔早在蒙元之前的辽金时期，便已经基本定型，信仰基督教的各蒙古化突厥部落不必多说，镇江建十字寺的马薛里吉斯家族、曾经出使欧洲出生于大都的把·扫马家族、元代著名文学家马祖常家族以及本文所提及的按檀不花家族的迁居历程都印证了这点，蒙元基督教的分布格局与这些族裔的迁徙密切相关。（2）蒙元基督教研究急需将各松散史料、遗迹资料、文字释读整合起来，加以勘比、分析、总结，发现诸多资料间的关联性，进而完善关于其信仰形态、实践及教义教理的整体面貌。（3）蒙元基督教虽以聂斯脱里派基督教作为主体，但其内部构成亦复杂多元，蒙元基督教管理机构如何管理这些来自各地的基督徒、来自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中的基督徒如何共同参与到信仰实践中、聂斯脱里派基督徒如何与其他各派基督徒交流互动，这些均是亟待完成的研究课题。

（责任编辑：袁朝晖）

① 松州故地恰为弘吉剌部按陈之子唆鲁火都封地，《元史》卷一百一十八“列传第五·特薛禅”载，成吉思汗“谕按陈之子唆鲁火都曰‘以汝父子能输忠于国，可木儿温都儿迤东，络马河至于赤山，涂河迤南，与国民为邻，汝则居之。’”

② 参见《少中大夫按檀不花碑暨夫人辛陈氏合葬神道碑》。